

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新探

祝莉萍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重庆市 400715)

摘要:怀疑主义的重大困难是其实践可行性问题,即怀疑主义者能否在生活中贯彻其怀疑主义。其实,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的实质就是悬搁判断与信念的相容性,因此,从信念产生的角度是能够解决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难题的。

关键词:怀疑主义;实践可行性;悬搁判断;信念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094-06

怀疑主义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于理性逻辑内部,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实践。“最能推翻庇隆主义(Pyrrhonism)或过分的怀疑原则的,乃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业务和工作。”^[1]大卫·休谟这句引用率极高的论断,隐含了怀疑主义一直面对的主要批评:怀疑主义不能在生活中被坚持和贯彻。这也就是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即“怀疑主义者能否在生活中贯彻其怀疑主义?”(Can the skeptic live his skepticism?)这一问题也是怀疑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面对的重要挑战。多数批评者认为,怀疑主义无法在实际生活中被坚持与贯彻。正如休谟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怀疑主义在理论上无比强大,但人的本性能轻易地击败怀疑主义,无论怀疑主义的论证如何强,在实际生活中却无法被坚持和贯彻。也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往往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本文将从人们对信念的产生的分析入手来尝试解决怀疑主义所面对的这一挑战,以便更好地展示怀疑主义的论证^①关于理性与信念的区分:悬搁判断奠基于理性,而信念奠基于非理性。

一、问题的缘起:疑与信的冲突

“怀疑主义者能否在生活中贯彻其怀疑主义?”这个问题如此古老以至于我们可以追溯到怀疑主义的鼻祖皮浪(Pyrrho)。皮浪是皮浪主义的创始人,作为

早期的怀疑主义者,他试图通过批判各种独断论给人们显示一种完全不受任何独断论干扰的宁静的生活方式:他身体力行地向人们展示没有形而上学的干扰,生活将多么地宁静而幸福。他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是我们从关于他的一些记载中可以了解到,皮浪认为事物似乎无差别,无法测量,无法裁决。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崇高,什么是耻辱,他都不加以判断,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将会陷入独断论的虚妄之中,因此他随遇而安,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什么,逃避什么。皮浪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悬搁判断以求得内心的宁静。虽然皮浪本人没有提出关于epoché(悬搁判断)的正式理论,但是他的行为已经隐含了悬搁判断的思想。简言之,不做判断,仅仅根据现象生活,不被独断论的信念所打扰,就是皮浪的生活写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皮浪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展示了怀疑主义的思想内涵,即悬搁判断。

然而,对任何问题悬搁判断,并以现象为生活指引的皮浪,却备受争议,而这其中尤以对于其理论在实践上的可行性的指责最为突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思想家蒙田在《论勇敢》中对皮浪作了这样的描述:“皮浪在不可知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学说。他和所有真正的哲学家一样,试图使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学说相符合。他坚持认为,人的判断力极其薄弱,不可能有什么倾向性的看法,主张对事物

^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针对的怀疑主义是以悬搁判断(epoché)为核心的皮浪式怀疑主义,哲学领域对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的讨论也主要针对的是这一类型的怀疑主义。

收稿日期:2008-12-21

作者简介:祝莉萍(1975-),女,四川西昌人,哲学博士,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近代西方哲学。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怀疑与信仰”(0709335),项目负责人:祝莉萍。

不下任何判断,使之永远悬而不决,视一切事物为不可确定,因此,据传他总是保持同样的举止态度和脸部表情。假如他已开始演说,即使听众已经离开,他也一定要把话讲完;如果他走路,哪怕遇到障碍,他也不停下来,他的朋友们必须时刻保护他,不然他就会掉进深渊,与马车相撞,或发生其他意外。因为害怕或躲避事物,是与他的命题背道而驰;他提出,人的感觉并不可靠,无法作出选择。”^[2]这里蒙田似乎认为皮浪的学说是不可行的,在生活中悬搁判断只会导致不断地面临困境。这种观点其实代表了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以悬搁判断为理论核心的怀疑主义不具有实践可行性,以至于如何能在真实生活中悬搁判断,就成为了从古至今的怀疑主义者不断被质问的重要问题。

哲学史上批评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的人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休谟。不过,有趣的是休谟本人也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而且,这种吊诡的事情却隐藏着问题的全部秘密:怀疑主义者对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的批评凸显了问题产生的根源。

休谟在论证外在物体存在时,从其经验主义的理论基础出发,最终得出了无法证明外物存在的怀疑主义结论。在他看来,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都无法为外物存在提供证据,人们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只能来自于想象,即人们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不能以理性为基础,而只能奠基于非理性之上。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怀疑主义的,也是令人沮丧的。不过,休谟接着指出,尽管在进行哲学思辨时,我们感到怀疑主义的巨大力量和无可辩驳性,可一旦离开书桌,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对外在物体的存在无法判明的无可奈何,而将外物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的。而这也就是休谟所说的人类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说,即使在哲学中没有任何去除怀疑主义的方法,但人的自然本性却是一剂良药,可以治愈人因哲学思考而患的“忧郁症和昏迷”,亦即消除怀疑。所以休谟说道:“这并不是说这种本性不知怎么就驳倒了怀疑主义,并证明它是不正确的。我们的自然的本能不能成功地对付或解决怀疑主义的疑惑;它们只是湮没了它们。人就是那样构造起来的,以致他必须相信比方说物体的存在,即使他无法用任何确当的理由为这种信念作辩护。不管多少确当的推理都不能使他摆脱由反省这个信念的根据而不可避免产生出来的怀疑主义疑惑。不过,我们确实还是摆脱了这种疑惑。”^[3]

从休谟以上的论证不难看出,一方面,怀疑主义

在理论上是不可辩驳的,另一方面,人的自然本性却是人们在生活中消除这种怀疑的良方,尽管这种消除并没有驳倒怀疑主义,而仅仅是使人在生活中暂时忘记了怀疑主义带来的疑虑,即用自然本性淹没怀疑。也就是说,从哲学内部纯粹逻辑推理的角度看,怀疑主义或者皮浪主义是站得住脚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无法被坚持的,因而怀疑主义与日常生活是相互矛盾的。由此,休谟不仅提出了对怀疑主义的重要责难,即怀疑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无法保持自己的怀疑,亦即怀疑主义在实践上不可行,而且揭示了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疑与信的冲突。

二、问题的实质:悬搁判断与信念的相容性

休谟关于外物存在的论述表明,他对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的批评主要是从怀疑主义与信念的相容性角度提出的。按照休谟的理解,对于外物存在的信念我们不能加以理性地判明,无法判断外物存在与否,对于这样的问题怀疑主义者只能主张悬搁判断,然而,坚持悬搁判断的怀疑主义者却无法在实际生活中继续维持他的怀疑^①,相反,只能屈从于他的本性而将外物的存在当作必然接受的信念,而忽略其无法判明这个信念的事实。也就是说,奠基于理性的怀疑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无法被驳倒,但是人的本性却能轻易地击败它。这就表明,怀疑主义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其实也就是怀疑主义的理论核心——悬搁判断——与怀疑主义者对实际生活的信念的相容性问题。

从总体上看,指责怀疑主义缺乏实践可行性的人往往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信念是人必不可少的,因为信念与人的本性不可分,信念是生活、行为的指引,当人没有任何信念时,就寸步难行,更别提正常的生活。因此,在大多数研究怀疑主义的人眼里,以悬搁判断为核心的怀疑主义必然排斥信念,因为悬搁判断必然带来对相应信念的悬搁,即对特定问题悬搁判断也就必然不能拥有相应的信念。所以,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休谟所揭示的怀疑主义与怀疑主义者本身的生活信念的相容性问题,即怀疑主义者拥有信念是否违背其理论主旨——悬搁判断——的问题。

查尔斯·兰德斯曼(Charles Landesman)也揭示了怀疑主义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按照兰德斯曼的观点,人的行动基于信念,信念与行为不可分离,而且

^① 这里需要指出,怀疑并不一定是否定的态度,而是一种存疑、无法判断的状态。当怀疑主义者怀疑外物存在时,他表达的是对此问题无法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是一种不确定的态度。

人也不能通过意志的力量来达到悬搁信念的目的,因而信念是人所必需的,是必然的。但是,怀疑主义的理论主旨却否定信念的存在,或者说刻意阻止信念的产生。因此,信念的必然性说明了怀疑主义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有两个障碍阻止我们悬搁关于外在事物的所有信念。第一个是实践的:如此的信念是行动的指南;不接受或承认感觉的证据,我们就不能从这儿移动到那儿。怀疑的悬搁似乎与我们的持续存在相敌对。”^{[4]62}“第二个是基于信念是非自愿的这个事实。……至于第二个原因,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当下的意志的行为而随意地阻止对任何命题的赞同。通常来说,我们的信念是由我们对相关证据的力量的理解所决定的。”^{[4]63}因此,“皮浪主义的普遍怀疑主义不能在实践中实施。根据人类行为的结构,它是无效的。”^{[4]64}也就是说,悬搁判断会阻止信念的产生,但信念却又是生活的必然指引,而且其产生是由于相应证据的力量而并非是自愿的,即不能仅仅依靠意志的力量而随意地阻止信念的产生和形成。因此,怀疑主义所要求的悬搁判断不仅与信念的产生不相容,而且从信念的本性看,怀疑主义也是不自然且不可能的。而这也就表明了以悬搁判断为核心的怀疑主义并不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信念的心理学》一文中指出:“从心理学层面考虑,信念的对立面不是不信,而是怀疑和寻求。”^[5]这就是说,怀疑与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这一观点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或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正是以这一观点为前提,人们得出了怀疑主义在实践上不可行的结论。而人们做出这一结论的论证逻辑就是:(1)信念是人类实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2)悬搁判断必然导致对相应信念的悬搁;(3)因此,以悬搁判断为理论核心的怀疑主义与信念不具有相容性;(4)所以,怀疑主义不具有实践可行性。

当然,对于信念是否构成人类生活的必要指引这个前提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的研究者从信念并非生活的必要条件来为怀疑主义辩护,并致力于描述一种无信念的生活状态。米尔斯·本耶塔(Myles Burnyeat)在《怀疑主义者能否在生活中坚持其怀疑主义思想?》一文中就探讨了无信念的生活是否可能的问题^[6];阿兰·贝勒(Alan Bailey)在《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与皮浪式怀疑主义》一书中对无信念的生活(a life without belief)^[7]也作了深入考察。这些探讨的共同结论是:如果能够澄清无信念的生活是可能的,那么,针对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的指责就会不攻自破。且不论这样的辩护策略是否有效,或者说无信念的生活是否可能,但这些辩护却进一步突出了问

题的实质——悬搁判断与生活信念的相容性,由此也提供了另一条探讨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的新思路,即:从人的生活信念的产生根源不同于坚持悬搁判断的怀疑主义入手来澄清怀疑主义与信念的相容性,从而澄清怀疑主义具有被贯彻于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性。

三、问题的解决:悬搁判断并非悬搁信念

怀疑主义的理论核心是“epoché”(悬搁判断)。而“epoché”的思想渊源则表明,从皮浪、阿克塞劳斯(Arcesilaus)、安尼斯得穆斯(Aenesidemus)直到塞克斯都(Sextus),均将“epoché”界定为悬搁判断,并且都认为悬搁判断会导致人们对信念的回避,只不过由于对悬搁判断的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epoché”导致对什么信念的悬搁上存在着分歧,即是对一切信念的悬搁还是仅仅对关于客观事实的信念的悬搁。不过,他们都认为悬搁判断必然导致悬搁信念,而这种观点也被后来批评怀疑主义的研究者所分享,并且也由此得出了怀疑主义在实践上不可行的结论。可见,从悬搁判断与信念的关系入手,探讨悬搁判断是否会导致悬搁信念,怀疑主义者是否一定是无信念者,是辨明怀疑主义是否具有实践可行性的关键。

如前所述,要澄清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就必须澄清怀疑主义与信念是能够相容的。不过,要澄清后一点,就必须澄清怀疑主义的悬搁判断并非悬搁信念。这就需要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深化解决该问题的逻辑思路:将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转化为怀疑主义的悬搁判断与信念的相容性问题,进而证明悬搁判断并不必然导致悬搁信念,或者说怀疑主义者能在不违背其理论主旨的前提下拥有信念,即怀疑主义者并非无信念者(unbeliever)。但是,要辨明怀疑主义者并非无信念者,就必须厘清信念与判断的关系以及信念得以产生的不同根基。

(一)信念与判断是可分的

从表面上看,休谟从人们无法对外物存在的信念加以判明而维护怀疑主义到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去解释信念的发生而指责怀疑主义,似乎从信念角度凸显了怀疑主义的实践困难,即其可行性问题。然而,从深层次审视,休谟的这个论述却蕴含着相反的结论,或者说,休谟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解决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问题思路:信念并非来自悬搁判断所否认的理性判明,而是基于想象。

按照休谟的理解,我们关于外物的继续存在和独立存在的信念,必然要么从感官中、或者从理性中、或者从想象中得到,但感官和理性都不足以成为信念的来源,只有想象才能产生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就此而言,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并未得到理性的判明;但

是,即使如此,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却仍然发生在包括怀疑主义者在内的一切正常人身上,尽管这个信念来自于想象而并不是被理性地判明了的。也就是说,缺乏理性判明的命题仍然可以作为信念被接受,或者说信念并不一定是被理性判明了的。由此,休谟试图表明:一方面,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是无法得到判明的,即理性和感性均无法证明外物的存在,因此按照怀疑主义的原则,关于外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只能悬搁判断;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是坚持悬搁外物存在的判断的怀疑主义者也必然会形成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这是他们进行正常生活的前提。那么,信念是如何产生的呢?休谟的解释是,信念的产生不一定与理性判断直接联系,被悬搁判断的命题往往可以凭借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主要是想象)而被认同或接受,也就是说,人们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可以在论据缺乏、悬搁判断的情况下依据想象而产生。

可见,休谟虽然强调怀疑主义在实践上不可行,但是他的具体论证却又蕴含着解决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困境的基本思路:怀疑主义的悬搁判断与信念的产生并不冲突,怀疑主义只是否定了信念可以被理性地判明,而并没有否定信念的产生和存在,因为无法得到理性判明的信念可以由非理性因素——想象——来提供。正因为如此,休谟在强调怀疑主义有理论上的不可辩驳性或强大的理性根据时,指认了怀疑主义在实践生活中会被轻易地遗忘这一事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对缺乏强大理性证据的命题的悬搁判断并不必然排斥人们对该命题具有信念。总之,休谟在对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提出强有力的挑战的同时,事实上又无意识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即把想象看作信念得以产生的根据。

实际上,除了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人们还有很多信念是无法得到判明的。而这些信念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产生就表明,人们悬搁判断并非必然导致悬搁信念,比如关于“他心”的信念,如何能证明他人与我一样有“心”,而不是一个会说话、有着和我一样生理反应的机器人?无论通过感官还是理性,都无法从逻辑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悬搁判断。但是关于“他心”的信念又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因为没有关于“他心”的预设,道德准则就缺乏基础。因此,在“他心”问题上悬搁判断并不影响信念的产生,或者说,信念的产生并不必然以悬搁判断所针对的理性判明为前提。

C. B. 布鲁斯指出:“古希腊怀疑主义者,根据其名字的古希腊词源,他们是观察者,不是无信念者;他们在所有的理论问题上保持漠然,并且仅仅温和地参与实际事务。”^[8]也就是说,“withhold judgment”(停

止判断)与“disbelieve”(不相信)不能被简单等同起来,坚持悬搁判断的怀疑主义者并不是无信念者;对理论问题悬搁判断,也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拒绝相应的信念。“对于怀疑主义者来说,所有命题都是无差别的。”^{[9]101}而怀疑主义者之所以认为这些命题是无差别的,是基于证据来说的,即每个命题都有与之等价的反命题,因此从证据的角度来说,所有命题都是无差别的。所以,怀疑主义者认为所有命题都无法被理性地判明而必须坚持悬搁判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相信其中的一些命题,因为相信与证据并不具有直接而唯一的必然联系,即信念与判断是可分的。

既然判断(这里的判断是指理性判断)与信念是可分的,那么,悬搁判断并不必然导致悬搁信念,而且无法得到判明的命题也可以被接受而成为信念。因此,坚持悬搁判断的怀疑主义,并不必然会导致悬搁信念进而在实践上面对不可行的困难。

(二)非理性因素:信念产生的源泉

如果说信念并不一定基于理性判明而产生,那么,导致或影响信念产生的因素就是休谟所说的想象之类的非理性因素吗?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均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这些回答,为我们解决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困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由于信念是认识论领域比较复杂、争议颇多的一个概念,其产生也极其复杂、涉及领域极广,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通过揭示影响信念产生的因素,特别是意志、想象、欲望等非理性因素以及权威对信念的作用,从而进一步说明即使保持悬搁判断的心灵也能拥有信念,即悬搁判断并非悬搁信念。

我们发现,坚持认为人们在生活中总会形成相应的信念或者说人们只能依据相应的信念才能正常生活的人几乎形成了以下共识:在缺乏理性证据甚至在存在着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意志、想象、恐惧、欲望以及希望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影响信念的产生,而其中尤以意志的作用最为明显,自我暗示与自我欺骗都属于意志间接影响信念的典型例子。正如人们对“相信”一词所作的词义分析所表明的:“动词‘相信’在现代英语中通常意味着拥有一个观点,而不论这个观点正确还是错误。”^{[9]7}

第一,意志对信念产生的作用。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信念产生的情形,就会发现意志对信念的产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理性证据缺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使掌握证据是获得信念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即当证据缺失,甚至证据所证明的是相反的情形,人们通过意志的力量也能够相信未被证据证明或者与证据相对立的信念。这种情形的存在也就为怀疑主义的悬搁判断并

不必然导致悬搁信念提供了机会。

龙尔干(Lonergan)明确区分了“判断”与“信念”：“似乎判断是非意志的而信念是意志的。”^{[9]90} 路易斯·P·珀吉曼认为，判断与信念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信念的产生往往受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他在《宗教信仰与意志》(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will)一书中从日常生活出发，给出了这样的例子：一个妇人发现了一些证明其丈夫不轨的证据，但是考虑到离婚将带来的不利，她选择了相信丈夫的忠贞，尽管她所得到的证据证明的是相反的情形^[9]。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也就是说，即使是对于那些强调无法理性判明事物或命题而只能悬搁判断的怀疑主义者来说，他们也能凭借其意志来获得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信念，因为，正如珀吉曼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意志对于信念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在缺乏证据或者与证据相对立的情况下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人们在意志对于信念的具体作用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是赞同意志对于信念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的这一立场却是共同的。意志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信念的产生。因此，在意志对于信念的具体作用机制上，学术界出现了“直接的意志主义”(direct voluntarism)与“间接的意志主义”(indirect voluntarism)两种不同的基本观点。“直接的意志主义即认为我们能直接通过意愿相信一个命题来获得信念的观点。”^{[9]50} 而间接的意志主义则认为虽然信念的获得不能仅仅依靠相信该命题的意愿，但“相信”(believing)的确涉及意志，因为这种相关性是间接地发生的。梅兰德(Meiland)认为：“我们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使自己相信命题，即使当我们有相反命题的充分证据。”^{[9]105} 尽管由于我们无法判断“直接的意志主义”与“间接的意志主义”哪一个更合理，而只能像怀疑主义所要求的那样对该问题悬搁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意志是影响信念产生的重要因素。据此，我们必须承认：在理性证据充足的情况下，人们会相信相应命题并具有信念，但也可能由于意志的作用而不相信该命题而不具有信念；在理性证据缺失的情况下，人们也同样可能由于意志的作用而相信或者不相信相应命题而具有或者不具有信念。也就是说，证据与意志都对信念的产生均有着一定的影响，单凭证据的缺失就否认信念的存在，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证据并非信念产生的唯一条件，意志的作用不容小觑。

第二，想象对于信念产生的作用。休谟是强调想象对信念的作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要是通过把“想象”看做是人的自然本性来分析想象如何导致人

们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的。基于前文对此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肯达尔·L·瓦尔顿在其著名的《恐惧想象》(Fearing Fictions)一文中，围绕一个假设的情景对“相信”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即：查理在观看一部恐怖电影时，他经历着和真实恐惧无异的感受，如心跳加速、脸色苍白等等，并且他描述自己的状态是“我害怕”。瓦尔顿通过这一分析，提出了“使相信”或者“假装相信”(make-believe)的理论^[10]。这个例子类似于一个古老的哲学例子：一个人被关在一个笼子里，悬挂在高高的尖塔上，虽然他的安全被确定，但他仍然汗如雨下，经受着恐惧的折磨。为什么他有“准恐惧”(quasi-fear)的症状？因为他相信他处于危险中吗？如同观看恐怖电影的查理，他知道自己安全的，两人既不会从尖塔摔下，也不会被电影中的怪物所伤害，但二者都同样经历着恐惧的折磨。按照通常的理解，恐惧根源于某种信念，即对身处危险境地的信念。但是查理知道自己只是在看电影，怪物不是真实的，笼子中的人也知道笼子是坚固的，不会从塔尖上摔下。那么，他们对危险的信念从何而来呢？瓦尔顿用“使相信”来解释他们如何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这里的“使”(make)在相反证据存在的前提下发生效用，使信念主体相信与证据相反的信念，并且在生理上产生了与真实情景相似的症状。尽管“使相信”理论遭到不少挑战，但是瓦尔顿的分析却表明了这样的情况：信念的产生并不单单是理性判明的结果，而有可能是想象的结果。

第三，欲望对信念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帕斯卡虽然反对怀疑主义的悬搁判断，但他从信念产生的角度为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做出了肯定性论证，即使这决非他的本意。对于帕斯卡来说，信念与非信念都是非推断的，因为，任何对立面的证据都是足够强的，因此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都不是理性的决定。在帕斯卡看来，如果无信念是强烈欲望的问题与心灵的邪恶，那么具有信念同样可以是强烈欲望的问题，这都与是否具有证据无关。欲望既能使人不相信有充足证据的命题，同样也能使人相信与证据相悖的命题。比如，博彩业正是利用了人对金钱的强烈欲望而使人们相信几率接近不可能的中奖。也就是说，只要欲望达到一定的强度，就会极大地影响信念的产生。

第四，权威对信念产生也有着一定的作用。L. B. 布隆指出：“在现代意义上讲，信念涉及对一个命题、陈述(即使当它暗示着某种知识)或者事实的赞同，并且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或者基于不充足的证据。”^[11] 也就是说，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权威往往成为人们确立信念的基础。

由此可见,导致信念产生的途径是多元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中分析了四种达到确定信念的方法:(1)固执的方法(method of tenacity),即持续坚持一个观点,反复地重申这个观点,并且拒绝考虑任何相反的证据或观点,由此达到对这个观点的坚定信念;(2)权威的方法(method of authority),即一个机构或者组织通过灌输教条并且惩罚有相反意见的成员而使其成员具有某种信念;(3)先验的方法(a priori method),即当一个人意识到在别的文化以及时代中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时,他会基于个人喜好以及天生的偏向而选择相应的信念;(4)科学的方法(method of science),即宣称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现实世界,信念应该基于这个现实世界^[12]。皮尔士认为,在这四种方法中,第四种优于前三种,因为它接近于理性判明的方法,但是,前三种仍然是人们形成某种确定信念的方法。固执的方法表明了意志在信念产生中的作用,因为人们固执地选择某种信念,凭借意志力拒绝其他观点以及相反的证据,从而不断加深这种信念;先验的方法既体现了基于个人喜好的意志的选择,也更多地体现了情感在确定信念中的作用;权威的方法表明对某种外力的盲目崇拜或者坚信。不管皮尔士对确定信念的方法的论述是否完善,但是它却佐证了一个基本观点:通向信念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即理性判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意志等非理性因素都是影响甚至决定信念产生的重要原因。

那么,怀疑主义者能够拥有的信念是怎样的信念呢?瓦尔顿在《恐惧想象》中对信念作了如下划分:直觉信念(gut belief)与理智信念(intellectual belief)。前者没有得到理性判明,主要是基于直觉(intuition)的信念,而后者是获得了理性判明(justification)的信念。依据瓦尔顿的划分,我们可以把怀疑主义者所拥

有的信念归结为前者。如果考虑到导致某种信念形成的多种因素,那么,坚持悬搁判断的怀疑主义者所能拥有的信念,就只能是基于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而形成的非理智信念。怀疑主义者也正是据此来保证其正常生活。

综上所述,如果将怀疑主义者的信念奠基于非理性的基础之上,那么,怀疑主义的实践可行性的困难就能得到解决。因为,悬搁判断并不一定导致悬搁信念,怀疑主义与生活信念具有相容性,因此怀疑主义者能在其生活中贯彻其怀疑主义。

参考文献:

- [1] 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M].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7:140.
- [2] 蒙田. 蒙田随笔全集:中卷[M]. 潘丽珍,王论跃,丁步洲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419-420.
- [3] 巴里·斯特德. 休谟[M]. 周晓亮,刘建荣译. 余宣孟校.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161-162.
- [4] Charles Landesman. Skepticism: the central issues[M].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 [5] William James. The psychology of belief[M]. Mind, Vol. 14, No. 55 (Jul., 1889), pp. 321-352.
- [6] The skeptical tradition[M]. edited by Myles Burnye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117-148.
- [7] Alan Bailey. Sextus Empiricus and Pyrrhonian Scepticism [M]. Clarendon Press, 2002.
- [8] Craig B. Brush. Montaigne and Bayle: 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skepticism[M]. The Hague, 1966, p. 5.
- [9] Louis P. Pojman.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will[M].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1986.
- [10] Kendall L. Walton. Fearing Fictions[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5, No. 1 (Jan., 1978), pp. 5-27.
- [11] L. B. Brow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belief[M]. Academic Press, 1987: 29.
- [12]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fixation of belief[M]. 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November 1877).

责任编辑 刘荣军

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Skepticism

ZHU Li-p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of skepticism is its practicability, which means whether the skeptic can implement his skepticism in life. In fact,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suspension of judgment and belief, so the causes of belief are the key to the problem.

Key words: skepticism; practicability; suspension of judgment; belief